

#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性源泉

蔡 昉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连续27年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换。

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理论各种流派研究成果概括的基础上,把莫衷一是的理论观点统一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经验的认识。同时,总结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揭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并提出实现这种转变的政策建议。

## 一、可持续增长应怎样实现

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大多数国家具有劳动力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因此,资本积累成为是否能够打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要素。例如,刘易斯(Lewis, 1954)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或者说如何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从4%—5%或更低的水平,提高到12%—15%甚至更高的水平。罗斯托也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从5%上升到10%或以上作为经济起飞阶段的条件。因此,在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被看作是唯—需要关注的生产要素。例如,标准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仅仅考察的是储蓄和投资、资本—产出比率及其与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琼斯,1994)。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投资增加从而工业部门扩大就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Lewis, 1954)。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不再做出劳动力无限供

给的假设。当把劳动力作为第二种生产要素纳入到增长分析中的时候,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学家观察到增长中存在一个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解释的部分,即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残差。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来自于这个残差中包含的因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产生的生产率改善,以及其他尚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因素。继承新古典增长理论传统的经济学家探讨了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各种因素,包括起点时的发展水平、常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各种度量、技术进步、开放程度、地理因素、自然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因素、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安定程度等等。这些理论都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发展需要如此之多的条件来保障,了解许多没有实现赶超发达经济的失败原因。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假设,把技术创新过程内生,探讨了报酬递增经济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和实际经验(萨拉-伊-马丁, 2005)。这种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水平提高造就的增长能力,与单纯增加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的增长能力相比,能够创造几乎无限的增长机会。历史路径、制度和地理因素都影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效果。这是由于报酬递增产生一个正面的反馈,可以使得国家或地区被“锁定”在特定的技术状态;由于制度可以构造知识被创造和使用的环境,导致国家或地区具有不同的技术创新能力和适应经济、技术状况变化的能力;由于知识不会无摩擦地在经济主体之间转移,知识的重要部分是根植于不同地方的个人和组织的日常活动之中的(Cortright, 2001)。因此,一切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努力都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以实现年平均9.5%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因素值得指出。首先,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

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严重不平衡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源泉。研究表明,1978—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中有21%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贡献。其次,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估算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王德文等,2004)。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25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不是生产率提高驱动式的增长。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增长方式能否使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例如,前苏联曾经表现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增长是典型的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而且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及至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持续(吴敬琏,2003)。在关于亚洲四小龙增长方式的判断上,存在着很大争议。艾尔文·扬(Young,1992)和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因单纯依靠资本的积累,缺乏生产率进步,因而尽管实现了高速度,但是并不意味着是什么“奇迹”。相反,这些经济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不可持续。已有的各种对亚洲四小龙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技术进步的估计大相径庭(Felipe,1997)。但是,随着计量技术和数据的改进,人们发现上述国家和地区既有高投资率也有技术进步率,而且,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技术和管理,TFP的贡献率逐渐扩大,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加快趋势(Bhagwati,1996),与前苏联的情形明显不同。而在获得较大的TFP贡献份额之前,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抚养比降低,产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使高速增长得以在较长时间里持续(Bloom and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1997)。

国内外经济增长经验和文献,有助于我们对于经

济增长各种因素作用的理论认识,提供了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政策启迪。虽然增长理论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相异的增长表现,但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对于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解释,以及不同时间、地点的增长经验,仍然可以统一地予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各国富有实践逻辑的经验,把众说纷纭的理论协调起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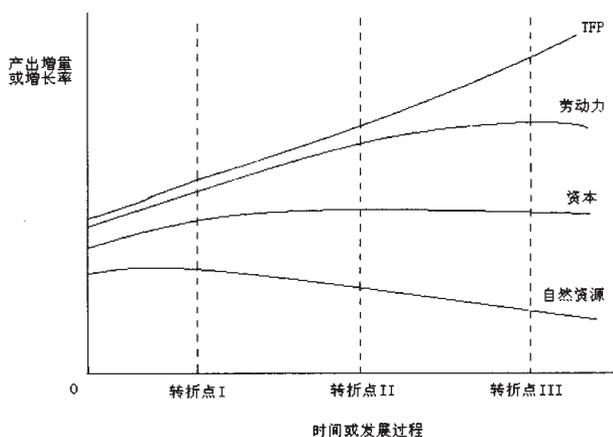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可持续性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通常体现在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初级产品上面,表现为农业经济相对大的份额,或者初级产品出口的较大份额。但是,依靠不可再生资源维持增长是不可长久的。因此,这种增长方式终究要遇到一个转折点,即从依靠资源转向依靠可再生的物质资本的积累。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和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逻辑,就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的。这个转折能否成功的标志,就是能否把国民储蓄水平提高到具有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临界最小水平。能否实现这个转折,是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最关心并且进行了充分讨论的问题,恰好是库兹涅茨关于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分野。目前,仍然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国家,本质上就是没有跨越这个必要的门槛。一旦实现这个转折之后,资本及其积累水平在经济增长中就开始成为至为重要的要素。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资本积累并不能无限地保持经济增长,终究要遇到第二个转折点,即把经济增长源泉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在这个转折点上,国家之间会发生分化,经验表明有三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是实现了这个转变,生产率提高成

为持续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例如,从 TFP 提高对增长的贡献来看,美国在 1948—1973 年期间高达 52.5%,在 1948—1996 年期间为 35.3%(Hulten, 2000)。第二种是没有实现这个转变,如由于劳动力短缺造成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未能保持其高速经济增长的前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三种是一些人口转变完成较快,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创造了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这样的经济增长条件,使得资本报酬递减过程后延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旦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老龄化过程加速并加深,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便消失,增长源泉必须转移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

## 二、转变增长方式的迫切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1957—1978 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做出的贡献中,有大约 13%被生产率的降低给抵消掉了(参见表 1)<sup>①</sup>。改革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 9%以上,TFP 的贡献率也大大提高,与亚洲四小龙的相应时期十分相似(帕金斯,2005)。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开放速度是空前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加深。例如,贸易依存度从 1978 年的 9.8%,提高到 1985 年的 23.1%,1995 年的 40.2%,以至 2004 年的 69.8%。在 1979—1984 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 41.04 亿美元,2004 年一年则达到 606.30 亿美元,增长了 14 倍。由于引进设备的技术是

比较先进的,并且有逐渐提高技术层次的趋势(Jiang, 2002),因此,生产率提高的很大部分是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加上计划生育政策成功的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 1/4 世纪的高速增长。

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估计,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图 2)。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 2020 年之前不会绝对减少,这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将保持相对高的水平,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维持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也是可能的。加上国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存量和流量,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未必构成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然而,根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资本仍然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如果没有人为扭曲的话,长期真实利率应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 2013 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不再提高,今后 20—3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加上未富先老趋势的影响,劳动力将出现结构性短缺,储蓄率也有下降的可能性。由于全球性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迅速老龄化,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Jackson, 2005)。

表 1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单位: %

	资本的贡献	劳动力的贡献	生产率的贡献	GDP 增长率
1953—1957	1.412	2.016	2.972	6.4
1958—1978	2.340	2.142	-0.582	3.9
1979—2003	4.108	2.316	2.676	9.1

资料来源:德怀特·帕金斯(2005)《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4 卷,第 4 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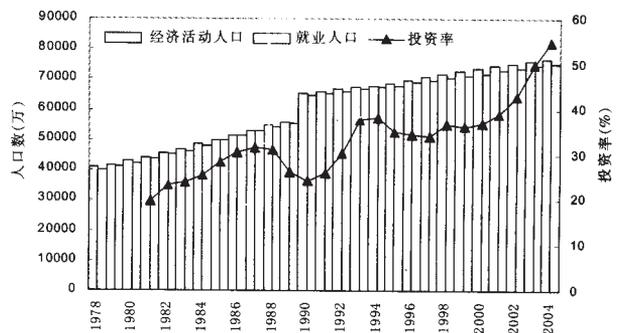


图 2 劳动力供给与投资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5》;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从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大多数指标来看,中国要么高于或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要么高于或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World Bank, 2003),目前尚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制约。然而,从总体上讲,中国在人文发展上也没有表现出异常的领先。尤其有若干因素使我们不能对此过于乐观。首先,中国正在以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高速度发展经济,支撑一个非

<sup>①</sup>分析中国各个时期增长率贡献的文献有很多,估计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同意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率贡献为负,改革以后这一贡献大大提高(如参见杨坚白,1991;世界银行,1998)。我们借用表 2 的估计说明问题,符合大多数经济学家共识的结论。

常的高速度,对相关保证因素的要求也更高。其次,由于政府投入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受教育阶段之间和人群之间的不平衡,中国的教育发展和健康发展水平,表现出严重的不平等。这种状况造成发展机会的差异,甚至一部分人群因受教育和医疗服务获得的特殊困难,成为脆弱群体,陷入社会边缘化的状态。

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为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高速增长的支撑能力日益减弱。与此同时,中国增长方式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有关资料表明,2001年全国能耗费用支出达1.25万亿元,占GDP的13.5%,而同期美国只占7%。中国11个高能耗产业的33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左右,这些高耗能部门与国际水平相比,每年多耗能约2.3亿吨标煤。1998年中国GNP总量占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3.6%。虽然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排放水平并不高,但按照单位产值计算,中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表2)。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7%。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

造成这种不可持续性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物质投入的基础上,而较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改革以来,由于非公有经济的成长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份额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观察TFP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注意到几个特点。第一,TFP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第二,TFP贡献增长率在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一项分部门的估计表明,

在1991—1997年期间,只有农业和交通、邮电和通讯业有迅速的TFP增长,而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TFP增长率较低,甚至有所下降(Hu and McAleer, 2002)。第三,1987—2001年期间,在整体生产率稳步改进的同时,如果把环境生产率与市场生产率分别观察的话,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Kaneko and Managi, 2004)。

### 三、转变增长方式的路径

迄今为止,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成功经验,以及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的教训,都表明这种转变是必然的要求,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下转第41页)

表 2

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比较(1998年)

单位:吨

	排放总量	人均排放	千元 GNP 排放	PPP 千元 GNP 排放
中国	3108.0	2.51	3.35	0.78
世界	22825.0	3.87	0.79	0.62
低收入国家	2418.7	0.69	1.31	0.32
中等收入国家	8830.1	5.90	2.00	1.06
下中等收入国家	6660.4	7.34	4.28	1.80
上中等收入国家	2169.6	3.69	0.76	0.47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1999/2000,2004)有关数据计算

全面开征水资源费。三是农业用水也要根据《水法》规定,研究开征水资源费,首先要从全国164个地下水超采区突破。四是要在提高水资源费标准的同时,按照优先开发地表水、严格控制地下水的原则,拉大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资源费标准差距,按照提高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利用率、整顿自备水源的原则,拉大城市公共供水水源与自备水源的水资源费价差。

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不单纯是水资源本身的问题,而是一场涉及全社

会用水制度和管水制度的根本变革。要建立和完善有关的制度,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工程体系和科技保障体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用水方式和用水习惯,形成全社会自觉节水的良好风尚,更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

(作者为水利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陈玉京

(上接第37页)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经济增长源泉才能逐渐转到依靠TFP的提高上面。

首先,通过发育生产要素市场矫正要素价格扭曲。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归根结底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投资者和生产者,在反映资源和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作用下选择而形成的。因此,只有在不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政策环境下,才会有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选择。尽管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端倪,至少在10年内,中国的资源禀赋还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为了发挥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需要得到鼓励,以便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同样,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意味着追求最前沿的技术,相反,越是与当前比较优势相符的适用技术,创新的成效越是显著,竞争力也越强。而一个充分反映资源禀赋结构现状和变化的生产要素市场,不仅是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必要条件,也是在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保持动态比较优势的保障。

其次,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场机制诱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为空间,即在不妨碍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政府行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应该以促进稀缺资源的最大化节约,以及促进丰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原则。鉴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

赋,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为了最大化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就能保证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

最后,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抑制造成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面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种制约和障碍,迫切的任务是形成一个激励环境,使新的增长方式为人们所乐于采纳。具体来说,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政绩评价体系相容的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环境治理中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资源的所属和环境的责任无法界定清楚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当事人往往追求个体或局部的短期经济利益,而以整体和全局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进行规制,利用直接或间接定价等方式加以抑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王晓红